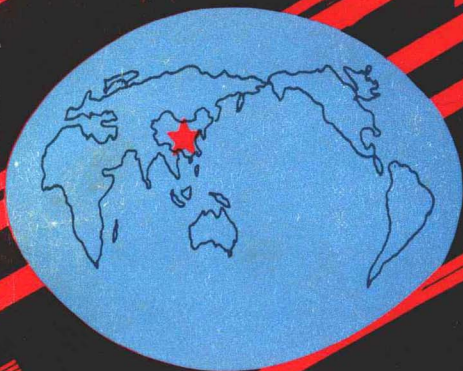


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



——反和平演变斗争讲话

出版社

703235

D643
26

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

——反“和平演变”斗争讲话

郭 泓 孙 健 林 木

济南出版社

(鲁)新登字 14 号

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

——反“和平演变”斗争讲话

郭泓 孙健 林木

责任编辑：曹国沛

封面设计：王晖

济南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济南陆军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印张：7.75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572—591—8/D·51

定价：3.50 元

(限国内发行)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到印刷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讲

- “扼杀”——“遏制”——“超越遏制”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由来与发展…………… (1)

第 二 讲

- 从杜勒斯的“预言”到东欧剧变
——“和平演变”战略的推行与实施…………… (20)

第 三 讲

- 全方位的“立体战争”
——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手段与途径…………… (46)

第 四 讲

- “箭”与“橄榄枝”
——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的原则、策略与特点…………… (88)

第 五 讲

- 七十二天风波
——一次流产的“和平演变”…………… (106)

第 六 讲

坚持立国之本

——抵御“和平演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38)

第 七 讲

走好强国之路

——抵御“和平演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174)

第 八 讲

警钟早已敲响

——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斗争回顾…………… (195)

第 九 讲

抓紧培养后备军

——抵御“和平演变”必须培养教育好青年一代…………… (211)

第 一 讲

“扼杀”——“遏制”——“超越遏制”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由来与发展

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干涉、颠覆和渗透，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屡遭失败后，它们越来越强调“和平”的一手，即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或叫“融合”战略、“超越遏制”战略。

一、“和平演变”战略的含义

什么是“和平演变”？尽管西方国家的代表人物在不同时期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这一战略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但“和平演变”战略的基本内涵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以军事威慑力量为后盾，通过非战争的和平方式，利用一切可乘之机，策动和配合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动势力，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搞垮人民政权，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演变，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和平演变”是相对“武装侵略”而言的。“和平演变”的实质并非和平，而是一种更为阴险、毒辣、因而也更具有危险性

的颠覆活动。它不是去占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而是去占领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阵地。通过培养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敌对力量，组织政治反对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平融化社会主义。

二、“和平演变”战略的由来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但“和平演变”思想的萌芽，则可以追溯到 40 年代末美国政坛的两名风云人物——乔治·凯南和艾奇逊。

乔治·凯南 30 年代在美驻苏使馆任职。二次大战期间，他在驻苏大使哈里曼手下供职。1946 年 2 月，由于美苏的战时合作瓦解，哈里曼回国后不再返任，凯南遂以代办名义负责美国驻苏使馆事务。当时美国国务院去电征求他对苏内政外交行动的看法。凯南于 2 月 22 日给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 8000 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这份长电为杜鲁门 1947 年 3 月的咨文提供了“理论基础”。1947 年 1 月底，已经回国在军事学院主讲战略理论的凯南，在“长电”的基础上写成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送给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供其“私人参考”。福阅后大为赞赏，认为“写得极好”，旋即推荐给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4 月，凯南经国务院许可，把该文送交《外交》季刊，于 7 月发表出来。

在这篇文章中，乔治·凯南第一次比较明显地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思想。他认为：由于长期加速进行工业化以及战争的破坏，苏联人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老的一代正在逐渐消失，而且，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其结果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

使得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实际上，美国政策的可能性决不限于只守着防线而期待最好的情况出现”。“要说美国的所作所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能够对共产主义运动行使生杀大权，并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早日垮台，那将是夸大之词。但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来表现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所谓“逐步趋于软化”，指的是苏联的“性格”将会出现以下的几种“属性”：第一，“我们可以期望有一个和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不相同的俄国政府”。第二，“我们有权指望[这个]政府权力的运用将不越过一条很明显的界限而陷入极权主义之中”。第三，“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不把压迫的枷锁强加于具有民族自决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凯南认为，“宁愿等待30年，也要通过这些曲折而缓慢的途径来打败克里姆林宫”。在实现这些目标后，苏联就“软化了”，“将容许在俄国早日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由此可见，凯南所说的“软化”，实际上就是要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

乔治·凯南提出的“和平演变”思想，受到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的大力赞赏，并在40年代末，将它作为一种战略思想初步提了出来。

1949年年中，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那场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已注定要失败。国民党反动派的

失败，实际上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美国援蒋反华政策的失败，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也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有一些人对当权的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的对华政策进行攻击和责难。双方争吵不休，相持不下。杜鲁门、艾奇逊这一派为了替自己辩护，突然摊牌，公开了一些侵略中国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材料。美国国务院据此于1949年8月发表了一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文件，也就是“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定《望厦条约》以来，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胜利为止的中美关系，特别详细地叙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中期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及原因。在白皮书发表前夕，艾奇逊曾给杜鲁门写一封信，并把这封信作为白皮书的序言一起发表。就是在这封信中，艾奇逊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他在信中说，尽管中国的解放战争胜利了，美国的武装干涉失败了，但是他们“仍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局面无论是怎样悲惨”，“无论中国伟大人口的主要部分”，可能“残酷地处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剥削之下，但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够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艾奇逊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毛泽东剖析说：“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再度获胜，推翻所谓‘外来制度’。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这种‘推翻’的工作，经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经过‘民主个人主义’之

手,据说,‘终将再度胜利’。”

针对艾奇逊的“和平演变”思想,新华社在1949年8月1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可奈何的自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的社论。社论写道:“艾奇逊并在白皮书公布的第二天即8月6日发表专门的声明,提出他的所谓五项原则,如果把这些原则不用骗术而用科学加以解释,那就是:(一)美国政府愿以每一可行之途径,鼓励凡能促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发展,俾能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之傀儡的任务。(二)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建立一种经济与政治之环境,可保障美国帝国主义代理人之人权自由地,并可逐步地发展美国的殖民地经济与买办阶级的福利。(三)美国政府反对中国脱离其干涉而独立……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决定继续从内部破坏人民民主的中国,并从外部压迫人民民主的中国。由此可见,只要美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没有变成人民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决意敌视中国人民到底。”

这篇社论对艾奇逊“和平演变”人民中国的战略意图作了深刻揭露,可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批判西方早期“和平演变”思想的一篇檄文。

但是,由于在当时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华奉行的主要是公开敌视的态度和军事侵略及军事威胁政策,因而搞“和平演变”并没有成为他们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想。

真正把“和平演变”开始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战略原则,是杜勒斯时代的产物。杜勒斯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他出身于名门,外祖父福斯特和姑父兰辛分别是美国第23任和第28任总统的国务卿。1907年,19岁的杜勒

斯随同其父福斯特出席海牙和平会议。福斯特是以中国清朝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会，杜勒斯则担任中国清朝政府出席和平会议代表团的秘书。会议期间，杜勒斯曾乘坐马车前往各代表团驻地，代表中国向其他各代表团致意。但后来，他却一贯坚持仇视中国、极端反共的政治立场。1953年1月，杜勒斯在美国国会考虑他为国务卿时，就提出了所谓“解放政策”，鼓吹“必须时刻记住”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他担任国务卿后，上任伊始，就在白宫发表声明，诬蔑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声称要“用和平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50年代中，杜勒斯在我国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的一次国策声明中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就是要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自由主义化或资本主义化），用“非战争的方法”、“和平的手段”，促使这些国家发生“演进性的变化”。杜勒斯说，社会主义国家“那些被奴役的人民是应该有自由的人民”，“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因此，仅仅就地限制俄国的政策本身就是一个不高明的政策，而且还是一个必然失败的政策”，“只有不断保持着解放的希望，只有利用一切机会，我们才能终止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怖的威胁”。“一切是可以而且是必须以这样的方法完成的，这种方法将不致引起世界大战，这种方法将不致引起叛乱，因为暴乱会被他们用血腥的暴力镇压下去”。“它必然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他还说，“我们也可以希望”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发挥作用的“自由主义化力

量”，“会使那些进行统治的人们不能不越来越多地按照自由原则办事”，“并且越来越多的使自己顺从根据受统治者的意志而实现的和平演变。这样，世界范围的真正自由时代就要开始了”。在这里，杜勒斯明确无误地将“和平演变”作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战略原则提了出来。因此一举，“杜勒斯”这个名字，也就成了搞“和平演变”的代名词。

三、“和平演变”战略产生的根源及背景

杜勒斯等人之所以在 50 年代将“和平演变”作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战略原则提出来，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的。从根本上说，它源于国际资产阶级仇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本性和一贯立场，同时又是国际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和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便在国际范围内激烈展开了。1917 年 10 月，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在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根本上动摇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十月革命”的胜利，揭开了社会主义逐渐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进程的序幕，同时也开始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较量。在这一斗争中，国际资产阶级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先后经历了从“扼杀”、“遏制”到“超越遏制”（即“和平演变”）的战略变化。

“扼杀”战略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英国陆军大臣、

后来接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首先提出来的。当时，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国际资产阶级妄图用武力将新生的社会主义婴儿“掐死在摇篮里”（丘吉尔语）。列宁高瞻远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就以苏维埃俄国的名义颁布了“和平法令”，宣布退出战争。苏维埃向英、法、美、意等交战国发出照会，建议和谈。但各帝国主义交战国根本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不但拒绝和谈，而且企图把俄国继续捆在他们的战车上，利用战争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为获得暂时喘息的机会，不得不以割让领土为代价，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被列宁称为“不幸的和约”的《布列斯特和约》。但帝国主义并未罢休。1918年3月9日，英国第一批武装干涉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其他协约国军队接踵而来。日本借口两名日本人被暗杀，派兵在海参崴登陆。美国军队尾随其后，趁火打劫。德国见有机可乘，也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转入了全线进攻，几天之内便占领了广大地区，并进逼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发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机中》的法令，全国总动员，英勇抗击德国侵略军，胜利地阻止了德军对彼得格勒的进犯。此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又先后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入侵。从1918年夏到年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先后占领了苏俄北部、南部、东部的一些重要地区，推翻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反革命自卫政府，并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把银行、工厂、商店和房屋重新交给资本家，把土地重新交给地主，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时，俄3/4的土地被占领和分割，40%的工厂停工，交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工人每天只能领到1/8磅的面包，有时甚至一点也领不到。这次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被

粉碎后,1919年初到1920年末,帝国主义协约国支持自卫军又先后三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第一次是英、法、美拟定的干涉计划,攻击的目标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第二次是协约国组织的所谓“十四国进攻”;第三次是英、法、美援助波兰地主军队和自卫军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进攻。在苏维埃领导下,红军和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经过三年艰苦的国内战争,到1920年底获得了全国解放,十月革命的成果进一步得到巩固。

30年代初,德、日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在美、英、法的纵容和扶植下,德国军国主义开始复活。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疯狂扩军备战,公开叫嚣战争。英、美、法帝国主义明知希特勒的野心勃勃,却绞尽脑汁将这股“祸水”东引。他们用妥协退让的办法,牺牲欧洲弱小民族的利益,去满足法西斯的贪欲,换取德国把矛头指向苏联,以图达到借希特勒之手扼杀或削弱社会主义的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当时赤裸裸地宣称:“如果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就可使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冲突中消耗力量,希特勒打败斯大林,自己也大大削弱,这不能不是令人高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吃尽了希特勒的苦头,美国也认识到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意与苏联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英、美、法却采取拖延战术,迟迟按兵不动,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打算借德国人之手削弱苏联。当时的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说过,希特勒军队是“主要危险”,但共产主义“也是不能容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得更露骨:“我希望看到德国葬身于坟墓之中,并希望看到俄国躺在手术台上。”不管德国法西斯如何凶残,英、美、法等国如何阴险,苏联人民

经过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最新材料表明，在苏德战线消灭了法西斯集团所有力量的70%。德国死亡人数在550万以上，而苏联在战争中牺牲了2700—2800万人。（据1990年5月7日，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华沙条约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卢余夫大将向塔斯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苏联人民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不仅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而且挫败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使社会主义的婴儿不但没有被掐死，反而不断成长壮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由一国胜利变为多国胜利，从而形成为世界体系。欧亚地区先后出现了15个社会主义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3，占世界土地的1/4。社会主义的这些胜利，宣告了西方反动势力“扼杀”战略的彻底破产。

看到社会主义日益深入人心，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反共势力又惊又怕。1946年3月，二次大战的硝烟才刚刚散去，英国的丘吉尔便匆匆赶到美国。这位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曾咬牙切齿地叫嚷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里”的先生，由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铁幕”演说。他惊呼“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声言“趁今天还为时未晚”，西方“要考虑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他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向美国和西方世界呼吁：“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怎么安排？丘吉尔认为，西方应加强军事实力，英美联合起来反苏反共。他的“铁幕”演说揭开了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序幕。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正式抛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杜鲁门主义”。“遏制”一词在英文里是“围”、“堵”的意思。“遏制”战略也就是围堵战略，即通过包围和堵截，防止社会主义势力的蔓延。

在欧洲，美国“遏制”的主要对象是苏联。苏联由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影响日益扩大。东欧一些国家又相继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在德、法等国人民中有强大影响，西欧资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帮助西欧度过战后经济难关，并将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使资本主义制度崩溃，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后西欧，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一派衰败景象。1946年底又遇上百年罕见的严寒，粮食和燃料严重匮乏，人民饥寒交迫，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美国深感“病人（指西欧）已奄奄一息”（马歇尔语），各国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此美国匆忙抛出马歇尔计划，并于1948年4月3日经杜鲁门签署后正式开始实施，先后拨出127亿美元给西欧“输血打气”。英、法、西德、意大利获得全部援助款项的60%。

杜鲁门宣称，执行马歇尔计划就“是为了明智而有效地实现我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事业”。其目的实际上有三个：一是以经济援助为名，行控制西欧之实；二是以经援为诱饵，迫使东欧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三是在西欧逐步形成以美国为盟主的抗衡苏联的力量。美国认为，西欧仅有经济上的复兴还不足以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只有在军事上建立起一道反苏屏障，才能“遏制”共产主义向西扩展。1948年3

月，英、法、荷、比、卢五国成立了所谓防止共产主义西进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但仍感到不足以抵抗苏联的“侵略”，因此要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美国抓住了这个机会。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12国外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字仪式，一个针对所谓苏联威胁的组织于是宣告成立。随后，美、英等西方国家加快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步伐。1955年5月联邦德国被正式拉入北约，并开始组建军队。这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

美国在“遏制”苏联的同时，又在亚洲重点对中国实施了战略包围。美国先后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并出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从三面包围中国。1954年12月，美国又同蒋介石集团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变成美国侵略亚洲和中国大陆的重要基地。

然而，不管丘吉尔的“扼杀”也好，杜鲁门的“遏制”也罢，一切都是徒劳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继续存在和发展。正是在武力“扼杀”不了社会主义制度，遏制也无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的国际大背景下，杜勒斯等人才把“和平演变”作为西方国家反对社会主义的战略原则抛了出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也就逐步成为这一时期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

四、西方新的战略转移与“和平演变”战略的发展

80年代中期，西方战略研究机构在总结20世纪以来80多年的世界发展历程后，进一步得出结论：用武力无法消灭和战胜社会主义，只能用经济竞赛、“和平演变”和发动无数次低